

韩 儒 林 传 略

邱 树 森

一、从村童到学术大师

韩儒林先生字鸿庵（一作宏安），1903年11月2日出生于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黄林村。父效愈，务农。二伯父绍愈，塾师。绍愈、效愈兄弟共有田地40亩，因绍愈无子女，故两人不再分家。先生6岁时入私塾，从二伯父绍愈读《三字经》、《百家姓》、《四书》等，未几，嗣于绍愈为子。1914年，先生入本村初等小学，改读国文、算术。1916年，考入舞阳县立高等小学，在校3年，学业大有长进，国学基础尤其坚实。

1919年夏，先生16岁时考入开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在校3年，除学习中学一般课程外，主要学习法文。1922年冬，该校法文班转入上海中法通惠工商学校。次年春，该校学生奋起抵制法籍校长的奴化教育，全校学生均被驱逐出校。先生辍学后不久，考入北京预大学科乙部。1925年秋，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学习。1927年夏，因官费断绝，家中无力负担学费，先生被迫休学回乡，先后任商丘河南省立二中历史、地理教师，开封中州大学秘书，开封省立一中哲学史、法文教师。1929年秋，再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复学，次年毕业。

在北大学习期间，先生选读了陈寅恪、陈垣等先生的中国历史课程，这些师长常常指导他去读一些外国东方学家的著作，使他从西方的治学方法中扩大了自己的视野，对我国西北舆地之学兴趣越来越浓。随着钻研日深，先生对几十年来国外东方学取得成

就和我国清季以来的西北史地研究作了比较，他说：“嘉道以后，我国学者在西北舆地之学方面的成就是很高的，可是由于受时代的拘限，没能进一步利用新材料，采用新方法，出现了停滞不进的状况，生命力就渐渐丧失了。例如清末西北舆地学家在古代译名的审音勘同问题上，常用音差、音转、音讹，急读来解决问题，读起来叫人产生雾里观花、牵强附会之感，不能令人信服；西方有成就的学者则别开蹊径，用汉语古音与民族语言或异国语音互相比对，进行解说，简单明了，耳目一新，另是一种境界。”他又说：“因此，我就遵照师长们的教导，开始从事所谓不中不西之学了。”（《穹庐集·自序》）由此可见，先生步上西北民族史研究之路，是与北大师长们的引导分不开的。

北大毕业后，先生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后与北师大合并）担任历史系助教，并兼任师大附中法文教师。1932年回河南，在开封高级师范学校讲授中外历史、地理、逻辑等课程。

1933年，儒林先生以其所译法人色诺博斯《西洋文明史》上卷取得中比庚款资助，去比利时留学。他怀着强烈的求知欲望，远涉重洋，入比利时鲁文大学学习世界中古史、拉丁文等。次年，课余时间从事将德译突厥文阙特勤等三种碑文进行汉文译注工作。是年秋，转学至巴黎大学法兰西学院，从汉学家伯希和（P. Pelliot）学金帐汗国史及中亚文字，同时在东方语文学学校学习土耳其文。当时留学生待遇极低，加上国内尚有家眷需要负担，他放弃娱乐、游览的机会，除听课外，常以书店为自学场所，用省吃俭用而得来的菲薄积余购置一批重要的东方学书籍，其中包括1836年版的迦特麦尔校勘的法译本《旭烈兀传》、1891年版胡达斯校勘的《札兰丁传》等。书店老板对他勤奋好学的精神和鉴别书籍的能力深为感叹。1935年转学至柏林大学东方语文研究所，学习波斯文、蒙文。是年完成《突厥文阙特勤碑译注》，随后又译注苾伽可汗碑、敦欲谷碑。此为我国最早之汉文译释。

次年，又到普鲁士科学院学习突厥文。至此，先生以自己的勤奋和天资，渐次掌握各种东方语言。

1936年夏，先生离柏林回国。他的突厥文碑译释得到陈寅恪、顾颉刚先生赏识，颉刚先生介绍他任燕京大学历史讲师，讲授西部亚洲史。又聘先生为禹贡学会研究员。是时，先生与颉刚先生及诸同仁朝夕相见，过往甚密，为先生从事西北史地之研究开辟了新天地，先生有关突厥史的多篇译著均在《禹贡》半月刊上发表。

“七·七事变”后，禹贡学会宣告结束活动。先生仍在燕京讲授蒙古史。1938年任辅仁大学讲师，讲授西北民族史。1939年毅然放弃北平的任职，冒着种种危险，辗转到达昆明，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次年，应成都华西大学之聘，任该校历史系教授。时华西大学成立中国文化研究所，先生为该所专职研究人员，因而有较多时间从事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在资料条件十分困难，敌机经常轰炸的情况下，他的创作却进入旺盛时期，连续在《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上发表论文。是年，应齐鲁大学研究所之请，讲演《元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提出了著名的我国元史研究五阶段论。1941年，顾颉刚先生发起成立中国边疆学会，自任理事长，先生被推为监事。1943年去重庆代替顾颉刚任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44年任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讲授元史及中西交通史。次年，校长吴有训聘先生兼任边政系主任。1946年夏，先生随中央大学由重庆迁回南京。抗战期间，先生正从国外学成归来，学术上日趋成熟，正是精力最旺盛的时期，尽管由于日寇侵华受到干扰，后方资料条件十分困难，但他始终坚持著述，在抗战后期的四、五年间竟先后发表了二、三十篇十分有见地的论文，在元史和突厥、蒙古、西藏等民族史方面，引起了学术界的注目。

抗战胜利回到南京后，先生仍任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兼边政

系主任。又应傅斯年之聘，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当时课程负担甚重：为边政系开设突厥史、蒙古史、西藏史；为历史系开设元史、东西交通史、西北民族史、中俄交涉史；为东方语言专科学校开设印度史、中国通史。先生学识渊博，悉心培养学生，由此可见一斑。1949年初，先生应台湾大学之聘抵台北，因目睹台湾混乱现状，偷听解放区广播，思想发生转变，于是年2月毅然返回大陆，曾向中央大学学生作台湾现状报告，劝导学生不去台湾为好。先生在旧社会饱尝辛酸，对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和倒行逆施深恶痛绝，因而决心跟共产党走，等待南京解放。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中央大学改名南京大学，军代表接管学校，任命先生为法学院代理院长、历史系主任。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他努力改造自己，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各项政治运动中去。1951年初，由南京大学校长潘菽介绍，参加九三学社。

1952年院系调整后，先生继续担任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1955年被选为江苏省第一届政协委员；1958年当选为江苏省第二届人大代表。1959年1月，先生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63年，当选为江苏省第三届人大代表。1965年，先生被任命为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兼蒙古史研究所所长。未几，因“文化大革命”爆发，先生返回南京，此后即遭到长达四、五年之久的政治迫害，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四人帮”粉碎后，先生继续担任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和名誉主任。1977年当选为江苏省第五届人大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儒林先生学术研究的方法、观点和方向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说：“解放后，我自感宛若进入了另一世界，一切新鲜，一切令人鼓舞。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我不仅要学会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研究元代历史，而且要使元史研究能为祖国文化建设服务。”（《穹庐集·自序》）1950年秋，当中

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取得重大胜利时，他发表了《西藏历史的回顾》；1959年当西藏反动势力发动的叛乱被粉碎时，他发表了《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用历史的事实阐述了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十年浩劫中，先生尽管遭受了种种摧残，但对党对祖国的信念始终未变。“四人帮”粉碎后不久，他以垂暮之年加倍工作。有词为证：“七五岂敢言老，指日四化非遥。今朝书卷重理，鸡鸣再迎春晓。”在他生命的最后七、八年里，写作热情尤其旺盛。他主持编绘了《中国历史地图集》北方地区历代图幅，亲自考订了清代内蒙古驿站的方位；主编了《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元代部分；主编《元朝史》并亲自撰写了前言，仔细审定了全书的初稿；他还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元史分册》主编，亲自撰写了部分重点条目。与此同时，继续从事必要的考释和考证工作，撰写了许多学术水平很高的论文。1983年在儒林先生去世的前夕，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部分重要论文集——《穹庐集》；他去世后，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整理了他的全部论著，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韩儒林文集》。

儒林先生十分关心我国历史科学、特别是蒙元史学科的发展，注意国内同行的团结和合作，加强同国外的联系和交流。1955年，他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所第二所学术委员。1956年与翁独健、邵循正一起赴乌兰巴托参加蒙中苏三国学者联合编写《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协商会议，次年再赴莫斯科讨论写作提纲和分工。此合作任务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未能继续下去。

“四人帮”粉碎后，我国学术界迎来了科学的春天。1978年他与翁独健先生等倡议成立中国蒙古史学会和元史研究会。1979年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他当选为副理事长；1980年元史研究会成立，他当选为会长。他还担任了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名誉理事、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江苏省

社联副主席、省历史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等学术领导工作。1980年赴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明史》编委会，当选为副主席。

1983年4月7日，这位在元史和西北民族史研究中造诣深湛的学术大师，因患前列腺癌，经多方医治无效而永远离开了我们。

二、勤奋、博学和科学方法是先生的成功之路

每年暑期即将来临的时候，先生精心培养的学生一批批毕业了，在他们将离校的前夕，他们总要请这位老系主任留下赠言，先生最爱写的赠言是：“业精于勤而荒于嬉”。的确，他用自己毕生的实践证明这句话是真理，用肺腑之言希望每一位走上工作岗位的同学能“业精于勤”而不要“荒于嬉”。

蒙元史和西北民族史之所以被人们称为“不中不西”的学问，是因为从蒙古兴起到元朝建立后的历史，包括了蒙族、汉族和其他各民族的历史，也包括了中国同亚、非、欧各国的相互关系的历史，因此蒙元史的研究必然涉及到中国和外国多种语言文字的历史文献，这就要求从事蒙元史研究的学者能掌握更多的语言文字；蒙元史既是中国古代史的一部分，又因为这时代特有的开放性，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特别频繁，这就需要有坚实的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的知识，以及目录学、版本学、民族学、语言学等方面的知识；蒙元时期的历史文献由于地区和民族语言的差异，再加上千百年来语言的变化，对人名、地名、名物需要不同的史料进行比勘，才能解决种种疑难问题，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来，这就需要掌握科学的方法。掌握这种基本功之后并不等于就能成为杰出的蒙元史专家，更需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树立唯物史观，否则是难以达到更高的学术境界的。

几十年来，儒林先生就是沿着这条道路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

的。

他从村塾开始，即悉心攻读启蒙读物，高小时攻读《古文笔法百篇》，国学基础逐步奠定。以后又在音韵、训诂上下功夫。在留欧预备学校读书时，攻读了法语。大学期间又掌握了英语。留欧期间，学会了德语，提高了法语水平。又攻读波斯文、蒙文、突厥文、拉丁文。以后又自学藏文。解放初期，先生已年近半百，仍孜孜不倦地学习俄语，出色地翻译了《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中的《蒙古人民历史的史料与基本文献概述》。先生掌握这么多的语言，靠的是勤奋，直到晚年，先生阅读外文书刊的习惯始终没有间断过。

先生认为，搞断代史切忌“香肠式”只懂一段，应该在通史的基础上研究断代史。先生虽主攻元史，对古代史却融会贯通，尤精于唐史、辽金夏史。他认真通读了像《资治通鉴》、《全唐文》、《全唐诗》这类卷帙浩繁的著作。因此，在古代史方面除开设元史外，他能毫不费力地开设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史科学、唐史等课程；他研究民族史，除主攻蒙古史外，又开设突厥史、西藏史、西北民族史、西北史地等课程；他兼通外国史，因而能开设印度史、中西交通史、中外关系史、中亚史。他学过法语，大学学的哲学专业，因而又开设法文、哲学等课程。这些课程并不多是他的研究方向，但都是为他的研究方向服务的。为此，他多半通过自学，掌握了语言学、音韵学、文字学、目录学、史科学、版本学、民族学等方面的知识。虽然他并不每门都极精通，而且直到晚年还常常向人请教，可见先生渊博的学问是长期积累的结果。

先生勤奋、扎实的学风，一直是他亲自建立的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的榜样。他反对急功近利，主张打好基础，循序渐进。他常常引用范文澜同志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作一字空”两句诗来教育弟子，常常说：学问是积累起来的，文章要经受时间的考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掌握了科学的方法，学问的大门就

打开了。

儒林先生晚年很注意总结他的治学经验。而这些治学经验是他回顾了中国和外国蒙元史研究史之后得出来的。他认为：嘉道以来，在西北舆地的考订方面虽有很多成就，但因不知域外史料，没有采用新方法，因而停滞不前。清末洪钧出使俄国，适逢拉施德《史集》的一部分俄文翻译和霍渥斯的英文《蒙古人史》出版，他请人帮助节译成吉思汗传并利用其他一些史料，纂成《元史译文证补》，使中国学者扩大了视野，于是屠寄《蒙兀儿史记》、柯劭忞《新元史》都利用了一些外国著作、域外史料，但他们都不能直接阅读欧洲和穆斯林著作，所利用的外国史料都是根据他人从欧洲文字重译的，于是出现了人云亦云、错上加错的情况。早期欧洲的蒙古史学家，多不懂汉文，不能与汉文史料互相比勘，译音用字规律不严，人名地名任意译读。随着欧洲东方学的进步，出现了一些有成就的学者，他们用汉语古音和民族语言或他国语言互相比勘，得出许多令人信服的结论。儒林先生就是吸收了西方有成就学者的研究方法，进一步发挥我国汉文和少数民族文献资料极为丰富的优势，把我国蒙元史研究的水平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先生治蒙元史、民族史之学，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以下三条对后学的启示尤为切实。

第一，审音与勘同。儒林先生在晚年所写的《关于西北民族史中的审音与勘同》一文中，系统地总结了治西北民族史必然碰到的头痛问题：审音与勘同问题。他说：“研究民族史，第一步的资料工作，不光是搜集，还要考订。这就需要在音韵训诂上下一番功夫，尽可能将译名复原，弄清楚它的意义，然后才谈得上整理资料并利用它来为研究服务了。”“要做好这一步工作，一，必须具有一定的音韵学知识，懂得汉字的古代读音；二，必须学习少数民族语文，懂得西北民族的语言规律；三，还必须知道不

同时代的翻译规律。”这些要求都是西北民族史地的特点所决定的，因为不弄清楚或不能正确解释这些少数民族的人名、地名、物名、制度、风俗习惯名称的含意，就不能正确利用或解释许多史料，就会出现同名异译、前后颠倒、或脱衍等现象。古书中少数民族的译名，用的是那个时代的读音，所以首先要辨明这些译名的当时读法，才能准确地复原，再将这些名称去和某一民族的语言去进行比较勘同。例如，《元史》中有奥都剌合蛮其人，他的名字是阿拉伯文Abd-ar-Rahmān的音译，意为“慈悲的奴仆”，四库馆臣改译为蒙文温都尔哈玛尔(Ündür Qamar)，意为“高鼻子”，读音和意思全变了；又如，根据元代的读音规律，l 在音节的末尾时，或转为n，或与其前面的元音字母拼读，从不用“儿”字来翻译，所以屠寄的《蒙兀儿史记》创造了一个“蒙兀儿”来译写Mongghol，就是昧于音韵学的虚构，有些历史学家用“伊儿汗”来译写旭烈兀及其继承者的称号Il-Khan，也是犯了同样的错误，正确的译法是“伊利汗”。

第二，充分掌握史料。先生主张史学工作者必须懂得目录学、版本学，对所研究的问题要充分掌握史料。他十分赞赏陆峻岭的《元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和周清澍的《元人文集版本目录》这些目录学、版本学的基础性著作，称他们的工作是“功德无量”的。他自己研究问题时，必定先全面掌握史料，尽量读最好版本的书，然后再考虑下笔，写史立说务得其实，蒙元史中史料讹误、歧异之处尤多，不经考证而遽据以写史，贻误自己也贻误读者。例如，他研究答剌罕制度，搜集史料上起南北朝，下迄明清，旁及伊利、钦察二大汗国；他读书常常查阅各种版本，例如《国朝名臣事略》则用元刊本，因为武英殿聚珍本是根据四库馆臣于敏中家藏本刊印的，人名、地名改译，脱文、错字很多。

第三，知己知彼，吸收各家研究成果。蒙元史是一门国际性学问。近一个世纪来，外国学者在利用穆斯林史料和欧洲文字史料

上，比我们早，也取得了不少成绩。先生常说，我们不应闭目塞听，要随时注意国外研究进展；我们不能拾人牙慧，要在别人的基础上有所创造。先生为文，喜欢先评介中外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哪些问题已经解决，哪些问题还没有解决，自己的文章要解决什么问题。他组织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的同志编纂中外元史研究论著索引，组织中青年同志在元史研究会上介绍国外蒙元史研究动态，并形成传统。先生与老一辈元史专家一直倡导元史界要开放，要放眼世界，这对我国蒙元史研究水平的迅速提高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的卓越成就

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一辈子辛勤的笔耕，儒林先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他主编的著作达一百数十万字，撰写的学术论文有五、六十万字。这些论著显示了这位学术大师是我国蒙元史及西北民族史这一领域中划时代的学术带头人。

第一，史料的发掘和阐释

先生研究边疆史地，是从突厥史开始的。唐玄宗时，后突厥大臣噶欲谷、阙特勤和苾伽可汗相继去世，分别立碑纪功。上世纪末，三碑先后在鄂尔浑河畔发现。1893年丹麦人汤姆森首先解通碑上之突厥文。其后，三碑相继被译成德文、英文、法文。先生留学欧洲期间，据德文、英文译成汉文，并加注释。自1935年开始，先后发表《突厥文阙特勤碑译注》、《突厥文苾伽可汗碑译注》和《突厥文噶欲谷碑译文》。这是三碑最早的汉文译释，准确的译文和精到的注释引起了当时史学界的瞩目。三碑的史料价值极高，大可补我国《周书》、《隋书》、《新旧唐书》中之诸《突厥传》之不足。从此，我国学界对突厥史地研究，史料有所开拓，研究也随之深入。

儒林先生涉足蒙元史研究后，十分重视中外史料的发掘和利

用。

如前所述，蒙元时期由于统治地域辽阔，中外交往频繁，汉文史料、少数民族史料和域外史料对蒙元时期的史事均有丰富的记载。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在引用史料上遇到种种局限。如汉文史料，清朝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下令将辽、金、元三史及同时代文集集中的少数民族的人地名等统统改掉，《元史》中的人地名则一律据蒙古语改，其实《元史》中的人地名有的译自蒙文，有的却译自阿拉伯文、畏吾儿文、藏文和其他文字，统统用蒙文一改，就出现了张冠李戴、指鹿为马的情况。于是，本来存在的一些好端端史料，二百年来人们反而不知如何利用。姚燧《牧庵集》里有四篇制文，因为这四篇制文中的人名、部名被四库馆臣改得面目全非，如拂林改为古哩、爱薛改为伊苏，致使后人莫知这四篇制文所指何人。儒林先生在《爱薛之再检讨》一文中用语言学知识加以勘同，始知这些宝贵史料原来是爱薛和爱薛家世的，这位元朝政府中地位很高的拂林基督教徒爱薛，在《元史》本传中只知他“初事定宗”，被视为贵胄的侍臣，现在才知道他原来是应唆鲁禾帖尼的邀请来蒙古的，与拖雷家族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地位十分显赫。掌握这一规律，四库馆臣改译的史书就能逐渐恢复其本来面目了。儒林先生之所以重视版本学，呼吁古籍整理时，如《续资治通鉴》及一批元人文集等，被改过的名字应统统改回来才好，就是要让被湮没的史料发挥作用。

再加域外史料，洪钧纂《元史译文证补》，为近代国人利用域外史料之始，在扩大元史研究领域上贡献不小。但洪钧以来，包括屠寄、柯劭忞在内，谬误亦多。三十年代以来，先生曾以很大的精力从事史料的考订，通过比勘，解决了域外史料与汉文史料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其具体考订详见下文），为国人研究和利用域外史料树立了榜样，对提高蒙元史研究水平，其功绩不可

磨灭。早在40多年前，先生在《元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中就提出：对波斯、阿拉伯文等各种文字的史料，中国学者必须突破依赖西人译释的局限，直接利用史料原文进行研究，用分力合作的方法，校注、评注上述各种文字的史料。建国后，他曾规划过将波斯文本的《史集》译成汉文，并着手培养了这方面的人才。先生的未竟之业，相信不久将由后继者予以完成。

第二，名物制度的考订

先生擅长民族历史名物制度的考释为学界所公认。但在“左”的思想盛行时，常被斥之为“鸡零狗碎”，加以贬低、嘲笑。其实，这些考释工作却是对社会进行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步骤。试想，一个民族历史上的人物、事件、部落组织、职官制度、风俗习惯，其名称、其过程、其含义、其结构、其规律尚未弄清，如何能弄清这个民族的本来面目、如何能认识它的历史发展规律呢？

以蒙元史为例，许多聚论不决的问题一经先生考证，随即迎刃而解。《成吉思汗十三翼考》采汉文史料《圣武亲征录》与波斯文史料《史集》互校的办法，把这场蒙古早期历史上，成吉思汗为了对抗泰赤乌、札答兰部贵族军队而组织本部的十三翼军，一一考证清楚，纠正了前辈诸史家的舛误。《蒙古氏族札记二则》采用同样的互校方法，订正了《史集》贝勒津本、多桑《蒙古史》、《蒙兀儿史记》、《新元史》中一些部落和氏族名称的错误。这类考证工作，表面上似乎是一些名称的纠正，实质上对研究蒙古社会的组织和社会性质至为重要。故儒林先生说：“人名地名一经勘同，其人其地在蒙古史上之价值，即顿然改观，此诚治《元史》者基本之工作。”（《成吉思汗十三翼考》）。

对于蒙元史中一些特殊的职官制度，如“答刺罕”、“阔端赤”等，先生也是悉心研究并详加考释的。答刺罕是蒙元时极为尊荣的称号，以往的学者多未能说明其封赠的具体情况及历史上

的演变。先生在《蒙古答刺罕考》中，论定此号始于南北朝时柔然族的“塔寒”，其后突厥人沿用，译为“达干”，为专掌兵马事的官名。成吉思汗以此号授于对他本人及其家族有救命之恩的功臣，受此号者，得享有自在下营、自己占有战利品和猎获物，免除赋税、九罪免罚以及“喝盏”（宴饮如宗王仪）等特权。到明代时，此号又有新的含义。《元代阉端赤考》则纠正了《元史》中将它与云都赤一并释为“侍上带刀及弓矢者”的错误，后人释为向导、从人亦不确，其本意实为“牵从马者”之意。此类职官皆为亲信侍从，在怯薛中地位重要。先生晚年撰写的《元代诈马宴新探》，考定“诈马”来自波斯文jamah，意为衣服，与蒙古语“只孙”（意为颜色，指预宴者着一色衣）来称这种宫廷大宴意思相同。这一考证为回回文化在元代的影响提供了佐证。

在突厥史、西藏史方面，先生许多考证文章价值是很高的。

《突厥官号考释》对突厥官号之来源、意义、职掌和演变的研究，颇多创见。如“俟斤”来源于鲜卑、柔然，契丹、女真沿用为“夷离堇”、“移里堇”；“特勤”之号始于吐蕃人，回鹘之“狄银”、辽代之“惕隐”、蒙古之“赤斤”皆沿之。先生之考释令人信服。《吐蕃之王族与宦族》、《明史乌斯藏大宝法王考》等论文，对“论”、“尚”等官职的解释，对明成祖时大喇嘛“哈立麻”（非人名，为噶举派一支派名称）的考证，也是功夫独到。

第三，西北地理研究

儒林先生素来主张研究西北民族史的人必须对西北的山山水水了如指掌。学生们对这位老师讲授民族史时，顷刻之间就能在黑板上准确地勾画出民族地区的河流山脉，无不感到惊奇。

先生的西北地理知识是刻苦阅读文献（包括地图）和实地考察得来的。

1937年，禹贡学会组织北平高校师生访问绥北。先生率一

路，自呼和浩特—武川—乌兰花—大庙—达尔罕旗王府，每至一地即实地考察，乃作《绥北的几个地名》，发表于《禹贡》。1941年发表《西北地理札记》，记述楼兰故城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及其距阳关、乌垒、鄯善、新都之道里，以及玉理伯里之方位，设里汪与失儿湾非一地、关于乌鹁等。先生虽未去过新疆，但根据地理学、语言学知识，对许多古地名作了精辟的考释。

建国后，先生在访问蒙古人民共和国期间，专门考察了喀喇和林遗址，对这座漠北古城有了深刻的感性知识；同时，又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那里获悉了汉代以来的古城遗址方位等资料。1961年，先生与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史学家，应乌兰夫之邀到内蒙古访古，西起包头，北至乌拉尔，行程1万5千余里，考察了历代长城遗址、阴山南北之汉代城堡、金代界壕、辽金故城遗址、鲜卑墓葬、历代古建筑、碑刻等。上述实地考察和访问活动对先生研究西北地理和完成《中国历史地图集》北方部分帮助极大。

1961年后，先生应谭其骧教授之邀，接受《中国历史地图集》北方部分的编绘工作。他亲自指导元史研究室的同志如何汇集图书资料、制定编绘方案，并帮助年青同志攻克难关。1969年编绘工作恢复后，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凭着渊博的地理知识和仅有的几本图书资料，只用了短短的二、三个月时间，就出色地完成了清代蒙古驿站的考证和定位工作。可惜，任务刚刚完成他又被迫中断学术研究工作。“四人帮”粉碎后，先生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发表了《清代内蒙古驿站的方位》一文。现在中外学术界瞩目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已经正式出版，人们将永远铭记先生对《图集》的一份贡献。

与此同时，先生发表的地理学论文还有：《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邻近诸部》，该文总结了中外学者研究元代西北史地的成就和缺点，对各部方位作了精确的考证；《唐代都波新探》根据汉

文史籍和突厥文碑铭资料，探讨了“木马突厥三部落”——都波、弥列歌和饿支的地区分布、官号等。

第四，用唯物史观研究元代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儒林先生的学术道路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学会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研究元代历史，使元史研究能为祖国的文化建设服务。在建国后发表的二、三十篇种论著中，可以看出这位老知识分子在学术上的探索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因而取得了更高的成就。

如前所述，《西藏历史的回顾》、《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是先生五十年代发表的仅有的两篇文章，两文均以具体的历史事实证明西藏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从两文发表的时机来看，可以看出先生以学术研究为祖国统一服务的用心了。其后发表的《论成吉思汗》、《耶律楚材在大蒙古国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等著名论文都是史论结合的好文章。前文从蒙古社会的发展，指出成吉思汗把遭受金朝压迫的蒙古各部统一起来，对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有很大贡献的；成吉思汗及其后人进入中原、独能取得成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影响；西征确有很大的破坏，但客观上带来了东西交通的繁盛。这篇论文意义在于：一是批评了“有些大汉族主义历史家心中横着少数民族做中国皇帝的时代必为黑暗时代的偏见”，对克服大汉族主义，巩固民族团结有现实作用；二是批判了当时的霸权主义对弱小民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一一贬低否定的错误观点。

先生一直在考虑写出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元朝历史的专著。1958年他主持草成了《元史纲要》一书，作为教课的讲义。“文革”后，他重新调整了全书的结构和章节，全书初稿完成后，他把自己对元朝历史的看法写成《〈元史纲要〉结语》，这是一篇从客观的角度全面观察元史的好文章，它辩证地说明了

国家分裂与国家统一的关系、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回答了人们头脑中对元朝的许多疑问：“我们不能机械地、绝对地看问题，说元朝一团漆黑，什么都糟得很。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元朝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而且在不少方面有它自己独特的贡献。”这篇文章对元朝社会的开放性、文化的多样性等方面的论述都是独到的。儒林先生去世后，《元史纲要》改名《元朝史》正式出版，并获得1986年国家图书优秀奖，这是对儒林先生一生学术贡献最好的评价。

作者工作单位：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历史系

如何鉴别古籍中的伪作

在古籍中混杂有不少伪书伪作。但前人辨伪，多着力于考辨伪书，而对并非伪托的古籍中羈入伪篇的问题则较少顾及。一般说来，这种情况多出现于各类总集与别集中。此外，一些经书、史书及子书中，也经常有后人将注文羈入正文的现象。

鉴别古籍中羈入的伪作，应注意这样几点：一、应尽可能地熟悉该古籍诗文的作者和与之交游者的生平事迹。这样，对于那些涉及到作者和与之交游者的诗文，就可能发现一些问题及解决问题的线索。二、应尽可能地熟悉该古籍的体例，内容及风格。太凡古籍，在其撰著、编纂乃至刊刻时，都贯穿有一定的体例，而伪作则一般难以与之体例相吻合。三、注意检核古籍的不同版本以及与之相关的文献。同一篇诗文，有时散见于若干种古籍中，通过考察这些古籍的编者、年代和刊刻时间及可信程度，来判断这篇诗文的作者与真伪。四、根据各种古代文化知识来判断真伪。诸如避讳、职官、地理、年代、目录学等方面的知识，往往可以成为我们辨伪的工具。

• 王瑞来 •